

晋商文化书系

晋商

文化教育读本

Jinshang Wenhua Jiaoyu Duben 吴秋生◎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晋商文化教育读本 / 吴秋生主编.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67-260-9

I. 晋… II. 吴… III. 商业史 — 山西省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229636号

晋商文化教育读本

主 编: 吴秋生

出 版 人: 赵建廷

责任编辑: 董利斌

装帧设计: 华胜文化

图片提供: 赵永刚

责任印制: 李 健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4922085 (综合办)

E-mail: sxjfx@163.com

网 址: www.sx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太原市钟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15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260-9

定 价: 25.00 元

序 言

学习晋商文化 传承晋商精神

明清晋商之所以能“贸易天下”、“汇通天下”、“富甲天下”，辉煌五百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具有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商业伦理；信义用人，恪尽职守的商业操守；稳健审慎，精明权变的经营原则；中庸和气、团结互助的团队意识。这些精神文化既充分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鲜明地体现了晋商的精神文化特色；给晋商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刚刚历经“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也引发了人们对危机产生原因的总结和防止危机再度发生的对策的探索。在这个痛苦的思索过程中，2009年3月18日

《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 AIG 得向山西大掌柜取经”的文章引人注目。文章建议美国 AIG 等在金融危机中惨败的公司高管们应当好好学习中国晋商的稳健审慎的经营原则、诚信为先的商业伦理、恪尽职守的职业操守。可见，晋商精神文化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和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世界范围内认同的优秀精神文化，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大力传承。

我校在晋商故里办学，经过晋商精神文化的长期熏陶，形成了为历届师生所认同的“艰苦奋斗，明礼诚信”的大学文化。在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作为以培养高层次商科人才为主的现代大学，要强化我校办学特色，提高我校办学水平，就必须认真继承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明礼诚信”的精神文化。在当今竞争激烈、优胜劣汰的各类市场中，没有艰苦奋斗精神的人无法立业，不能明礼诚信的人无法兴业。因此，致力于成为事业有成、受人尊敬、对社会有贡献的莘莘学子，应当认真学习和切实践行晋商精神文化。

要成为富有晋商精神的人才，首先必须认真学习好晋商精神文化知识。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学习晋商文化，传承晋商精神，我校晋商研究院的老师们在广泛阅读晋商史料，认真核实晋商史实，深刻理解晋商文化的基础上，精心编写了这本教材，比较系统和准确地总结了晋商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值得同学们好好地读一读。我希望同学们在认真研读这本教材后，能准确而深刻地领会晋商精神文化的实质，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文化营养，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像晋商那样艰苦奋斗、明礼诚信、开拓创新，不断创造事业的新辉煌。

任海生

2009 年 11 月 5 日

目 录

第一章 晋商兴起的精神文化 / 001

第一节 穷则思变拓四方 / 002

第二节 艰苦奋斗兴商帮 / 017

第三节 开拓创新办票号 / 032

第二章 晋商经营之理念 / 041

第一节 顺势而谋、适时而为的业务拓展 / 042

第二节 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经营谋略 / 057

第三节 乡邻相与、区域分工的集聚经营 / 068

第四节 人无我有、人弃我取的市场营销 / 077

第三章 晋商管理之技术 / 087

第一节 任人唯贤、赏罚分明的人事管理 / 088

第二节 审慎稳健、精明权变的业务管理 / 101

第三节 内控严密、调度灵活的财务管理 / 114

第四节 收集完整、沟通有效的信息管理 / 125

第五节 奖励有效、约束有力的分号管理 / 134

第四章 晋商治理之策略 /143

第一节 两权分离、组织严密的治理结构 / 144

第二节 信义用人、身股制人的治理方略 / 155

第三节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治理效果 / 166

第五章 晋商衰败的文化因素 / 179

第一节 农商思想，不适应工业社会要求 / 180

第二节 依赖人治，不适应民主社会要求 / 190

第三节 信用经营，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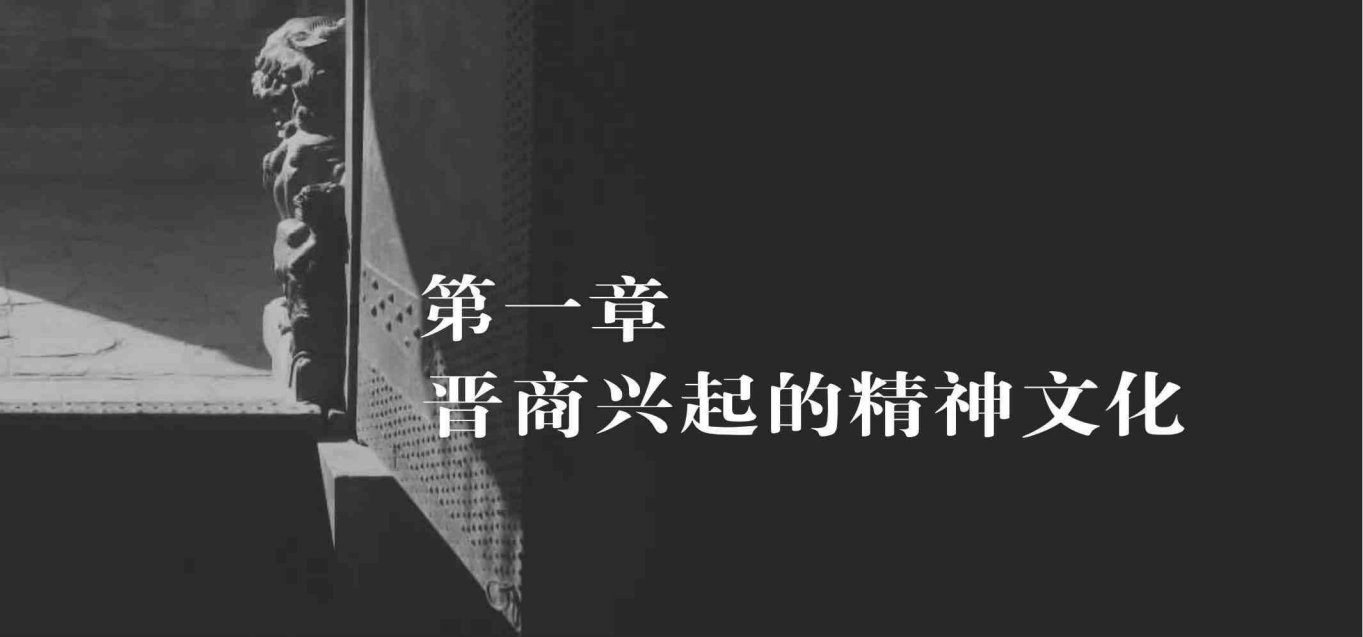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封闭轻学，不适应现代发展要求 / 209

清朝山西商人之商路示意图 / 218

近代山西票号分布示意图 / 219

主要参考文献 / 220

后记 / 221



第一章

晋商兴起的精神文化

晋商崛起的原因很多，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区位优势等，但晋商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有利条件转变为现实的商业优势，在中国商界异军突起，辉煌五百年，最根本的原因是根植于晋人思想深处的穷则思变、艰苦奋斗、诚信礼让、善抓机遇、勇于创新的精神文化及其产生的强大商业动力和高超的商业智慧。正是这种先进文化的力量，让山西人擎起了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的大旗，造就了晋商“贸易天下”、“汇通天下”、“富甲天下”的商业辉煌。

第一节

穷则思变拓四方

一个地区的人文精神的形成是与当地的物质、地理条件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山西人稠地贫，使得山西人求变求富的意愿异常强烈。穷则思变、外向开拓、务实进取的文化心理深深植根于晋人的思想意识之中。

一、地瘦人稠，被迫外拓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全省山地占73.8%，黄土丘陵地占11.7%，盆地平原占14.5%。地表水十分贫乏，属于旱缺雨地区，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尽管自然环境恶劣，但是，自宋、元以来，由于境内战事较少，社会比较安定，人口偏多。随着人口的增加，山西成为一个少地缺粮的省份。据明代的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田地14.05亩，而山西平均每人只占有田地10.28亩，少于周边陕西（13.61亩）、山东（13.78亩）、北直隶（30.23亩）、河南（75.81亩）各行省。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占有田地又减为6.92亩。人多为患，所产粮不敷食用，百姓生计艰难。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总数还多30万人。山西人多地狭的矛盾非常突出。为缓解这一矛盾，从洪武到永乐年间18次从山西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晋省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晋南是重点区域。伴随着移民的洪流，晋南人走向了全国，打破了“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参与到全国的商业竞争中去。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民谣中流露出的是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山西省洪洞县是当时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著名的洪洞大槐树下曾集结过一批又一批外迁的山西移民，他们举家老小从这里出发流散全国各地，另觅生计，直至福建和两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的突出表现。

除了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外，民间自发的外出经商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史记·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清代康基田在《晋乘蒐（sōu）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

高耸于平遥南大街的市楼



荒，良土灌罨。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初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开始大量外出经商。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晋南、晋东南、晋中地区外出经商者犹众。

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优势也为晋人外出经商提供了良好条件。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的山川地理环境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山西险要的形势使它在历史上一直居于战略要冲的地位，明代实行开中制，紧靠北部巨大的军事消费区的山西人具有其他地域的人们所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而且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等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域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互补，使山西商人得以从南北物资交流中获利。

人稠地贫的压力和地理区位优势，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怀揣致富的梦想，摆脱了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义无反顾地南下中原，北出口外，贸迁四方，逐步形成了山西人穷则思变、外向开拓的集体性格。

二、务实重商，积极外拓

黄河流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至清代，黄河中下游已经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是以黄河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农业生产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周期规律使人们相信天道循环，衍生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定式，进而使人们普遍具有务实的精神特质，相信有付出就有收获。

而山西人的务实传统得以加强还得益于他们与游牧民族的交流。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在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中，物质重于文化，贸易多于交流，在山西这一过渡区形成了务实的传统，强化了山西人注重实用、主张务实的人生观与价值判断。他们大多不是投身政治或苦读圣贤书，求取功名，而是为了自身生存，跋山涉水，从事贸易，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投身戎马倥偬之中。

务实精神与穷则思变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在山西这块特定的土地上，升华为浓厚的重商观念和悠久的工商业传统。

1. 商业传统悠久

山西处于北方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的接壤过渡地带，这种经济地理环境决定了自古以来，太原地区就兼具畜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形态，具备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积累了较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技术与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粮食与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基地。而北方游牧民族自古逐水草而居，一直依靠商业贸易和战争掠夺解决其日常必需品的消费。这种差异性导致汉民族与游牧民族很早就山西展开贸易。

自先秦以来，山西商业一直比较发达。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大地就是商业人才辈出之地，并积累了丰富的经营思想。晋国历史上的著名商人计然就提出过“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余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欲速富，当畜五牴”的经营理念；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这些思想与他们成功的经营实践一起成为后世商人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乔志强先生在《山西通史》一书的绪论中说：“山西自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大都有山西商人进行。”两汉时期，山西商业贸易主要是盐铁及其他日用品，太原等地的粮食也经汾河漕运长安。两汉与匈奴时有战争，但双方的商

业贸易也较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武帝时山西马邑（今朔州）人聂壹就从事这种贸易。聂壹之所以青史留名，是因为他在经商的同时还搜集军事情报，并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事实上当时从事边关贸易的人并非只此一人。汉代山西商人甚至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①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及国家求取财富的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商业的发展。西晋时，一些官僚贵族还亲自经商。当时，商人地位有很大提高，商业异常活跃，贸易异常繁荣，山西太原逐渐成为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在北齐，太原城内已经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太原也是各地物资集散、珍宝荟萃之地，大量的畜产品、美酒及金银珠宝在此交易。除国内贸易外，山西地区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北齐时，中亚、西亚人出于逐利的需要，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太原等地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大大便利了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隋唐时，以太原为中心的交通也非常发达，向西南可通长安，再西出则为古丝绸之路，向南可通洛阳，东出井陉关可通北京、辽宁和朝鲜、日本，极大地便利了太原与各地的贸易及联系，太原也被誉为是“锦绣太原城”。宋元时期，山西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增加，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明清崛起的山西商人，更是辗转万里，纵横欧亚，开中国内地开放之先河。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大自然赋予山西的优越地理位置促成了务实重商的品格。这种品格又塑造了山西人卓尔不群的文化秉性。

2. 重商主义盛行

明清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一直以来运行的赋税制度到明清时期发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由于畏惧丁税，流亡迁徙、

^①清末，山西灵石县发掘出了16枚古罗马铜币，从币面看，为罗马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与我们汉代属同一时期。专家还推测，今天灵石县的贾胡堡村就是当年西域商人的聚集居住之地。《后汉书》中有“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记载。

隐匿户口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所以“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因遭大地主的阻挠而停止了。然而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清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实行了“赋役合一，按亩计税，以银折办”，进而实行了“摊丁入亩”政策，把农民的一般徭役都并入地亩之内，放松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使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别的行业，便于农产品的商业化。同时，商品生产有了更大发展，城市人口增加，手工业作为商品生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活跃，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开始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晋商得到了大发展。

当时山西盐铁行销天下，尤其是河东盐经历了由官办到清初的“哇归商种”，成为完全商办的盐业生产以来，资本积累增加，明代山西出现了财富达几十万至几百万的巨商。晋商成为与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商帮。山西蚕丝和棉布的生产从明代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潞绸、泽帕、平遥颜料都是著名的产品。山西开始种植烟草和设立作坊制作旱烟后，又为山西人带来新的赢利之途。曲沃烟草最为有名。山西矿产丰富，潞、泽两府的冶炼业，大同、朔平两府的煤炭业历史悠久。所有这些说明，受山西境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才把山西商人推向全国各地。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观念的变革，明清时期重商观念开始流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交换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开始形成，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依据商人的籍贯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帮”，如晋商、徽商、陕商、浙商等，这些商帮纵横全国，促成了一种新的商人群体的形成，有利于商人的自由发展；二是商人资本开始了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巨商大贾的社会示范效应，商业利润的巨大诱惑，促使社会上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全国上下一派经商风气，货殖逐利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在商业厚利的诱惑

下，一些儒士也不再甘守清贫寂寞，转而投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认为，明清大批儒士“弃儒就贾”的原因，一是人们对“商”的观念的变化，使儒士能从容于商；二是仕途的艰难，迫使一些儒士转而从商；三是商人的成功，诱惑着儒士从商。在这股潮流中，山西人无疑是这股潮流中的弄潮儿。

商业发达区域的人们普遍偏爱工商业，注重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功利动机。北宋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在西安、洛阳、开封这一条线上，山西一直处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拱卫区，代有才人辈出，民众中普遍形成了一种建功立业的心理。南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山西失去了区位优势，但这种心理成为一种潜在的追求，存在于山西人的潜意识中。明清以来，政治中心再次移向北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山西人在科举一途受到的挫折遂转化为在经商领域的巨大动力，一代又一代的晋商前仆后继，终于成就了席卷天下的宏伟事业。当时俗谚云：“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经商似乎更能实现山西人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山西人建功立业的传统古已有之，盘点山西历史可以发现，自先秦到明以前，山西一直是人才辈出之地。

先秦时期，三晋大地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灿若星辰，魏国李悝变法，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韩国的申不害变法，使他们可以称雄于战国。三晋大地被后人称为是法家渊薮，时代先锋。诸子百家，璀璨夺目，权变之士，纵横一时。荀子、韩非子，一代宗师，叱咤风云，令山河变色；傅说、百里奚，破格纳贤的佳话千古流传；晋文公一代霸主，介子推割股奉君；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美名流传；豫让吞炭，忠心报主；程婴、公孙杵臼，托孤救孤；史官董狐，秉笔直书；李牧、赵奢，诸侯恐惧。从两汉到唐宋，山西一直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卫青、霍去病马踏匈奴，英勇冠天下；武圣人关羽义盖千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西，是名副其实的龙兴之地。尽管国家四分五裂，但其中有许多乱世豪杰，在山西这块土地上风云而起，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他们由此成了名垂千古的人物。故而，太原被称为“北都霸府”。千秋帝王业，不如少年狂。太原公子李世民在太原起兵，开创了盛唐气象。唐朝以文学取士，山西涌现出

了大批文学家。从初唐到晚唐，山西诗人支撑了半部全唐诗。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四杰之一王勃妙笔生花成就了一大名阁；旗亭画壁，王之涣诗才名动一时；白居易腹有诗书居自易；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除了王维、王之涣、白居易之外，名传千古的山西诗人还有宋之问、柳宗元、王昌龄、卢纶、温庭筠……他们共同撑起了唐朝文化一片灿烂的天空。一代女皇武则天承启了贞观、开元盛世；著名政治家狄仁杰处事公正，断狱如神；书法家柳公权开创刚劲风气……从隋唐到两宋时期，边患不断，山西人保家卫国，英雄辈出，刘武周、尉迟恭、杨家将、呼延赞、狄青……多少耀眼的名字还在熠熠闪烁。宋代是一个精致的时代，艺术成就臻于顶峰。山西书法家“大米小米”画云山，“马一角”画半山在画坛成为绝唱。大政治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至今仍为政治家所广为借鉴。元朝时以戏剧闻名，山西就是当时一个戏剧中心，关汉卿、白朴……山西剧作家创作的优秀剧目流传至今。金元词冠元好问，一代诗才作史才。但明清以后，山西的精神文化向世俗文化跌落了，晋人将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转变为在商海拼搏的动力。

忻州人王锡纶在同治年间写过一篇《晋省贫富强弱策》，论述了19世纪中叶山西全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风俗习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年山西的社会经济形势。他说：“泽、潞为历代劲兵之处，而太原、忻、代、朔平、宁武、大同，皆家近绝塞，日见投石超距之为。其桀者莫不呼鹰走犬，挟弹弯弧，其生性然也。是故韬略之士，争出其间。”这段史料说明山西因为地处军事战略要地，故民风刚健有为，在古代出现过李牧、廉颇、卫青、霍去病、柴绍、尉迟恭、薛仁贵、杨业、狄青等杰出的军事家。历史发展到明清时期，山西人“不勇于为强而勇于为富”，建功立业的心理使得山西人“盖其平居，彼此相胜，各思创一未有之业，以冀奇获”，以致出现了“交、文、清源之间，挟囊适船厂、博魁者，动数千人”的景象，作者不由得感叹“此安得不富乎？”

传统社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规定了“士、农、工、商”的四民顺序，而在明清时期的山西，由于三晋文化的穷则思变与务实精神所形成的张力，使得山西人开风气之先，转变了原有的农本价值观念，重商主义达到顶峰。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促成山西人经商的重要因素。自明以来山西经商的人愈来愈

愈多，形成从商的庞大群体。从事商业的群体中，有一定数量的大小掌柜、管账先生，但更多的是店铺的大小伙计。不论当掌柜的，还是当伙计的，一般都可以改善家庭生活，甚至发家成为新的资产者。正是由于从商利益丰厚，渐渐地，经商成为人们敬慕的职业，于是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

一方面，准备读书做官的，开始弃儒从商。平遥县达蒲村李氏是由仕宦之家经商而发展起来的。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在元朝时有李实任官于山西，后落户平遥达蒲村，经营商业。自清乾隆年间在平遥城开设颜料庄，生意渐渐做大，成了平遥颜料行的首户。后来又遇雷履泰，一位出众的掌柜，道光初年把颜料庄改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西裕成颜料庄变为日升昌票号，李家迅速发展起来。李家除日升达、日升通4个钱铺和日升庆布庄、日升货栈外，在天津设有东如升、如升大颜料庄，在汉口设有日升裕钱铺、东如升颜料庄和日升昌德禄局。同时，为其家庭生活所需，在达蒲村设有绸缎、杂货、药店、成衣局、干果、肉铺、水菜、理发等一系列店铺。直至如今，该村百姓还说那些店铺是：“领的李家本，吃的李家饭，赚的李家钱。”人们重利轻名观念强烈，致每年参加乡试的人数减少，几千年来士、农、工、商的顺序被倒过来，商为首，士居末，与封建伦理相对。清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学政刘於义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土风卑靡。”雍正帝阅此奏章，写下朱批：“山右大



西口古道

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

另一方面，一些有教养的农家子弟，放弃为仕求功名之路，纷纷随人经商。至于在私塾读书未入府、县学籍的农家子弟，也积极央人投入商界。晋人积极从商，不仅因为从商可以有较多的收入，而且还因为商界是培养造就人才的好地方，学知识，长才干，懂礼仪，守规矩，所以都愿意把子弟送入商界去当学徒。忻州王锡纶在《馆僮说》中说：“近数十年，忻、太、汾之间，弃农即商，三江两湖，滇、黔、闽、粤以至西北两塞外，万有余里，贸迁所至，足迹几遍。”

三、抢抓机遇，乘势外拓

如果说穷则思变是晋人经商的原动力，务实重商是晋商发展的文化基础，那么晋商的崛起则是凭借晋人对机遇敏锐的洞察力、雄视天下的开阔视野和抢抓机遇的超强能力。

1. 抓住开中制带来的机遇

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统一东北柳条边和万里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为了防御外夷的侵扰，统治者沿边设立九镇驻兵把守。这九镇是：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偏头、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大同、偏头二镇在山西境内，而每一边镇又辖众多卫所。像大同为西北重镇，以镇守总兵、副总兵、游击将军所驻守者为中路，阳和（今阳高）、天城（今天镇）二卫为东路，左云、平鲁、威远（故址在平鲁县北30公里）、朔州（今右玉地区）四卫为西路，构成沿边320多公里的防御线。按照永乐年间的统计，九边镇共有驻军863135人，配备军马342000匹。如此庞大的官军和军马所需军粮和马料的数量是巨大的，而边地接近沙漠且又荒凉，农业生产落后于中原，当地所产远不能满足边镇军粮需要，所以朝廷一开始就令近边省份向边镇运送粮食。因道路险远，民力艰难，耗费巨资，山西当局认为是个下策。为了解决北边军镇的粮饷供应，减轻运粮的耗费，明洪武三年（1370年）于大同仓开始实行“开中制度”。这种制度是：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便可向政府换取盐